

香港疫情大爆发 香港 深度

动态清零逾两年，香港失去外资和人才：经济代价是甚么？

“有些人对香港的信心已动摇。其他人也可能在外地找到工作。我不认为他们会回来。”



2022年5月19日，香港天际100观景台上俯瞰维港夜景。摄：林振东/端传媒



梁越等 | v

2位作者端传媒记者 梁越、袁慧妍 发自新加坡 | 2022-05-26

2006年，Steven（化名）因普通话水平未及工作要求，须离开香港转往新加坡发展。到达樟宜机场，看着井井有序的人工植物装潢，这名美国人暗自决定，总有一天会回到他心目中充满狂野活力而真实的香港。

7年后，他当上一家策略顾问公司的高级主管，并如愿回港，只是当时他未想过2022年的今日会再次离开。“不是清零政策本身，而是政策背后的缺乏理性（lack of rational），令我选择离开。”

疫情两年多，港府一直都紧随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政策。因应第五波疫情爆发，港府更再度收紧防疫措施，包括极严谨的社交限制、疫苗接种政策、商务营业限制等，加上一直“封关”，和长达两周甚至三周的入境隔离措施，不论是本地抑或外国商界均频频发声，要求港府直视清零政策背后有形无形的经济代价。同时，不少金融机构都调低香港今年经济增长预测，由2%至3%下调至0.8%至2%不等。

去年11月，香港美国商会前会长早泰娜（Tara Joseph）因为清零政策而决定请辞。即使第五波疫情后防疫政策开始松绑，5月1日更开放非港人入境，但也挽留不了想要离开的人。早泰娜坦言，香港难以回复原貌，“以往，西方国家的人都说笑，香港就像Asia-lite（将香港比喻为饮品的轻量版，轻盈容易）。你可以自由进出，轻易开设公司和投资，一切都是如此轻易。现在不是了。”

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逐步迈向与病毒共存，那港府坚持清零政策，尤其是过去逾两年的“封关”和对国际旅游的限制，会带来甚么经济代价？昔日港府引以为傲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又能否随着放宽防疫政策而回复？

人口与外资

“香港一直是一个疯狂的城市，比东京更疯狂……而且只需要20分钟，你就可以到达那些漂亮的岛屿，攀上起伏不断的山岭。”提到香港，视讯中的Steven表情雀跃，略带一点怀缅。他知道随时可以回港，但他不会回来。“香港会一直在我心中。”

在港多年，Steven感受到香港的变化——由2014年雨伞运动，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乃至2020年国安法实施，他知道香港早已人事全非，但社会运动和政治并不是他离开的原因，“国安法不太会影响到我。”





2022年5月10日，中环交易广场外，一名外籍人士在户外的空旷地方午餐。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2年4月，他重回家乡，坦言离开主因是香港严苛的清零防疫措施。Steven因呼吸道问题，不适合长期戴口罩，上述的山峦美景，他再难踏足；纵使亲人抱恙甚至过身，亦因来往航班经常因熔断政策而停飞，加上每次出入境都需要长时间隔离，他难以回国：“我只能每年回去一次……每一次回国，都是冗长而昂贵的。”

香港的防疫政策朝令夕改且严苛，其跨境流动限制更是令商业，尤其是跨国企业的商务活动困难重重。外媒近月亦报导多家外资正计划将部分员工由香港转移到新加坡，大部份为金融业，例如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法兴银行、摩根大通。Gary Ng表示，相较于受不同因素影响的整体人口净流出，“外资企业及其人才的流失明显是清零政策带来的即时影响。”

根据[香港美国商会](#)、[香港欧洲商务协会](#)，及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官方组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香港事务所、香港日本人商工会议3个日方单位近1年内进行的[商业调查](#)，三国的受访企业不约而同表示，除了政治、法治不确定性等因素，疫情亦是其中一个企业面对最明显的挑战和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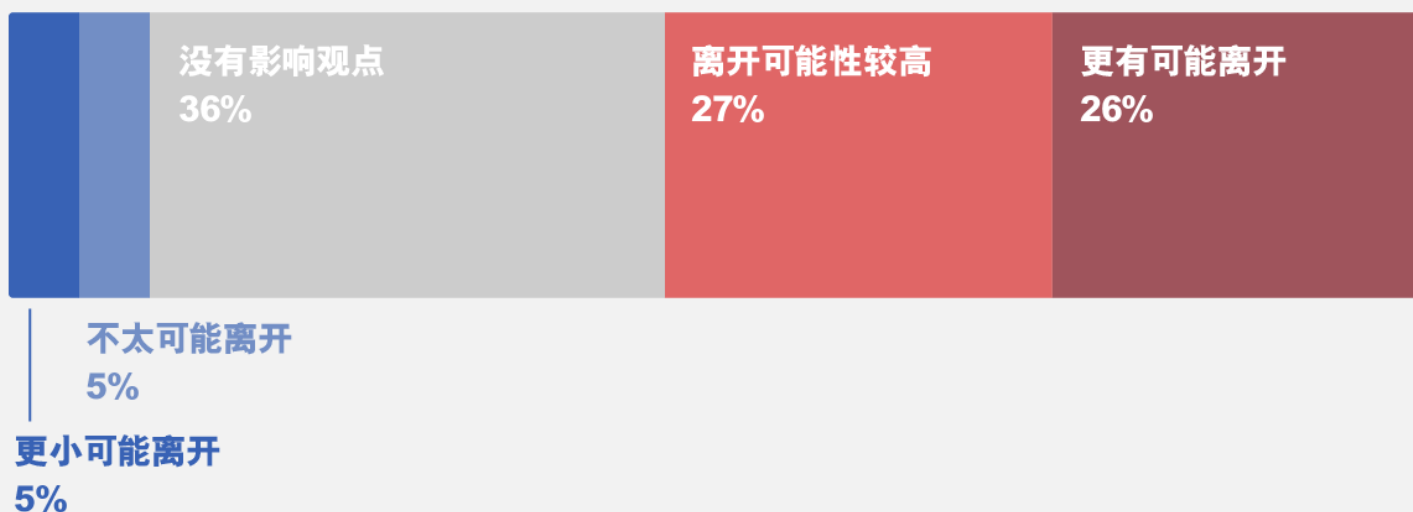
美国商会于2021年9月10日至10月8日，向262名会员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当中包括151名主要企业代表及111名个人会员。结果显示，44%受访者认为国际旅行限制令在香港以外的办事处受到阻碍；在使香港缺乏竞争力的十大因素方面，76%认为是旅行限制和隔离措施，关于生活成本和营商成本的分别有84%和60%，而政治体系亦有54%。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亦发现逾8成受访者指出港区国安法对企业营运有影响，包括47%受访者认为员工士气受影响；45%认为失去已移民的香港员工。

而欧洲商务协会则于2022年1月18日至2月5日期间，向260名企业会员进行线上问卷调查，结果发现，65%受访者认为香港疫情限制影响到公司在港的商业策略和计划，更直指香港有可能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外国人离港潮，其规模甚至是近代亚洲数一数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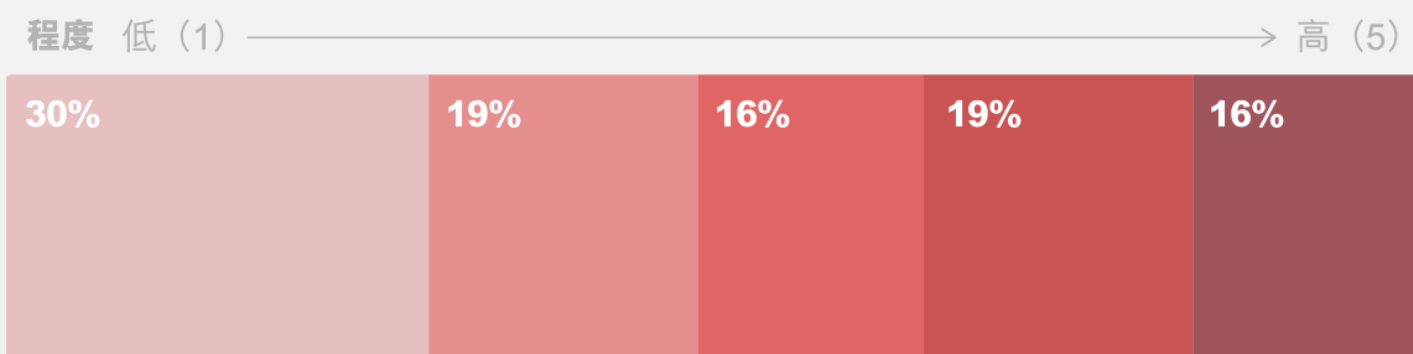
疫情带来的限制是否影响员工留港？

香港美国商会调查



自2020年初，企业有否出现异样的大量员工流失？

香港欧洲商务协会调查



资料来源：香港美国商会、香港欧洲商务协会

疫情初期，Steven并不反对严谨的防疫政策。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经济学家Gary Ng表示，于经济及社会而言，清零亦非全然坏事，“2020年时，清零带来的好处会比较多一点。当时始终不清楚世界和病毒会变成怎样，香港都受害了，疫情得以控制。”

成怎样，香港都受惠了（疫情得以抑制）。”

然而，香港的防疫政策没有随时间而改变。早泰娜刚辞职回国时，最令她惊讶的是各国早已前行，包括放宽外出戴口罩的法规、出入境限制等，“对比之下，香港好像从来没有改变。”

Steven说，每当他听见有人说，香港防疫政策虽然严苛，但生活仍算是正常，他就感到愤怒。“每个地方都需要扫瞄（安心出行），这不是正常的。外出一定要戴口罩，这亦不是正常的。只能2人在餐厅进餐，这也不是正常的。”而且，这些限制时常改变，又似没有尽头：“不能去健身室1个月，好，没问题。半年，不紧要。然后就是1年。这天说会开放，过几个月又说要关闭。”

他开始觉得清零政策不是为了防疫，而是为了其他原因。“这次疫情显出，香港政府官员的唯一标准，就是忠于中国，并满足中国的任何要求。”2022年1月，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动态清零，我承认是一个内地的策略要求。”她续称无法对动态清零4个字作出权威的解释，皆因她“不是始作俑者”，然而，香港政府仍然会以动态清”为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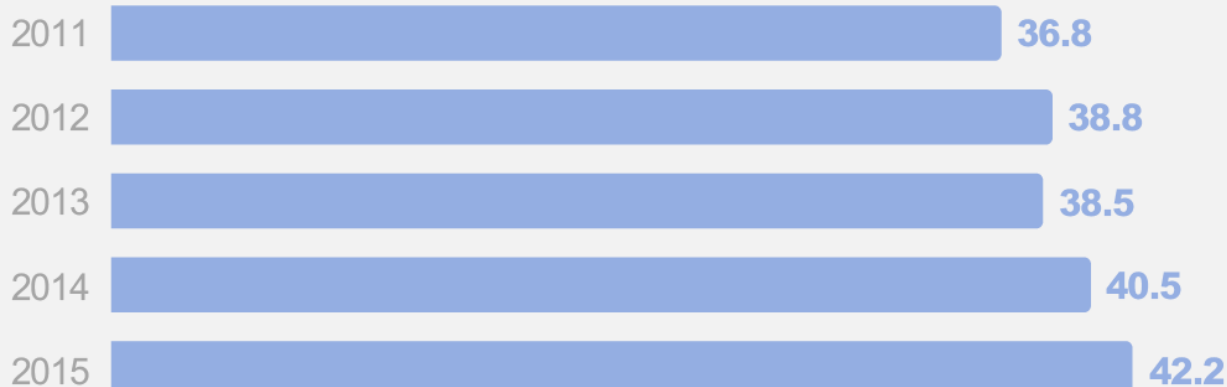
Steven以及他的同事，陆续选择离开。Steven所处的公司，约有100名员工，过半为本地人。“绝对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离开香港，25%的同事都已离开了，他们亦不全是外国人。”除了同事，他亦听闻有不少其他公司及行业的外籍人士准备离开，原因亦是清零政策波及他们的日常生活。

另外，Steven观察身边很多暂未离开的外籍人士，只因手上物业未及放售，或者正等待小孩学期完结。他预计，今年6、7月学期完结，香港人才流失的实际数字将会明显上升。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据，2020年的境外驻港公司（包括海外及中国大陆）在港总就业人数，在连续6年增加后，第一次下跌；2021年更创下近3年新低，下降至47.3万。

境外驻港公司在港总就业人数创近3年新低

境外驻港公司在港总就业人数（万人）





2020年的境外驻港公司（包括海外及中国大陆）在港总就业人数，**连续6年增加后，首次下跌；2021年更创下近3年新低，下降至47.3万。**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



端传媒
Initium Media

香港是商务自由的城市，人口流动本是常态，但问题是否能找到替代的人才。“现在香港是找不到外来的人才，没有人会来的。”陈相因（化名）是一间德国原材料厂商的亚太区负责人，他向端传媒表示，香港办公室有10名外籍员工，当中有2人请辞离开香港。“2个看似不多，但是专程在外国派驻过来，当然是一些必要的位置。如果流失了这些人才，损失会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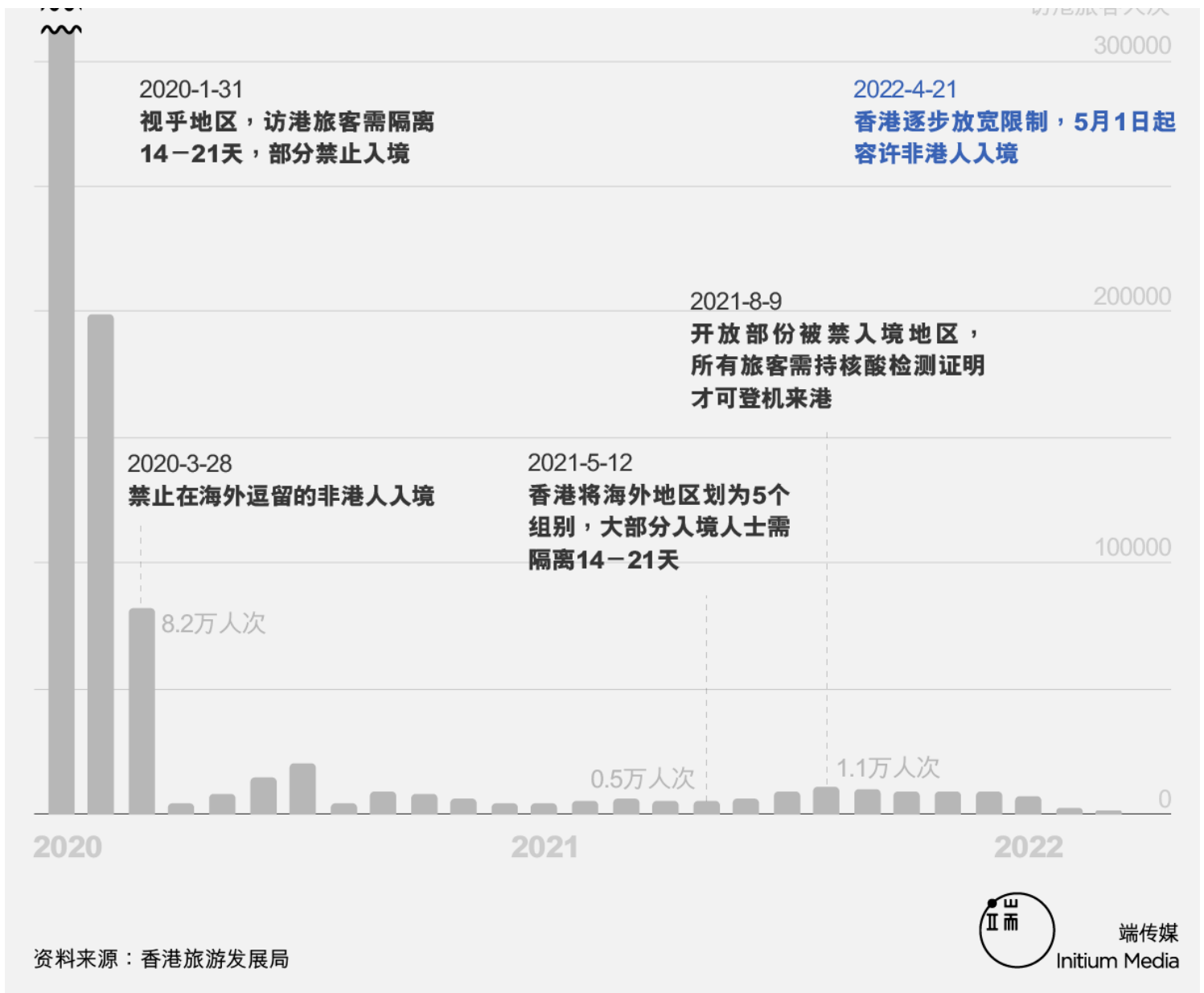
同时，陈相因的公司亦饱受香港清零政策之苦。随着疫情起伏，香港境内限制时有放松，但对外的入境限制则一直收紧。自2020年3月28日，港府宣布禁止在不同海外地区逗留的非香港居民入境香港，直至今年5月1日，港府才宣布逐步开放非港人入境限制，但入境者仍需要隔离7至14天。

陈相因表示，香港办公室的销售团队，由出外拜访客户、建立关系、参加会议和展览，再回去德国与工程部同事商讨新产品的开发事宜，“这些由有旅游限制开始已经停摆。”今年2月，有一个相关产品展览于杜拜举行，由于隔离时间太长，“（回港）要21日酒店隔离，展览会才4日，经济上不可行。”所有香港办公室的员工都无法出席。

疫情时期访港旅客数字

320.8万人次

访港旅客人次



幸亏公司有客，业绩仍能维持疫情前水平，“但作为跨国企业，是要追求每年增长，以往平均都会有10至20%。何况，客人是会流失的。”陈相因指公司正考虑将小部分员工迁离香港，“如果情况没有改善，就会考虑将整个亚太区总部调去另一个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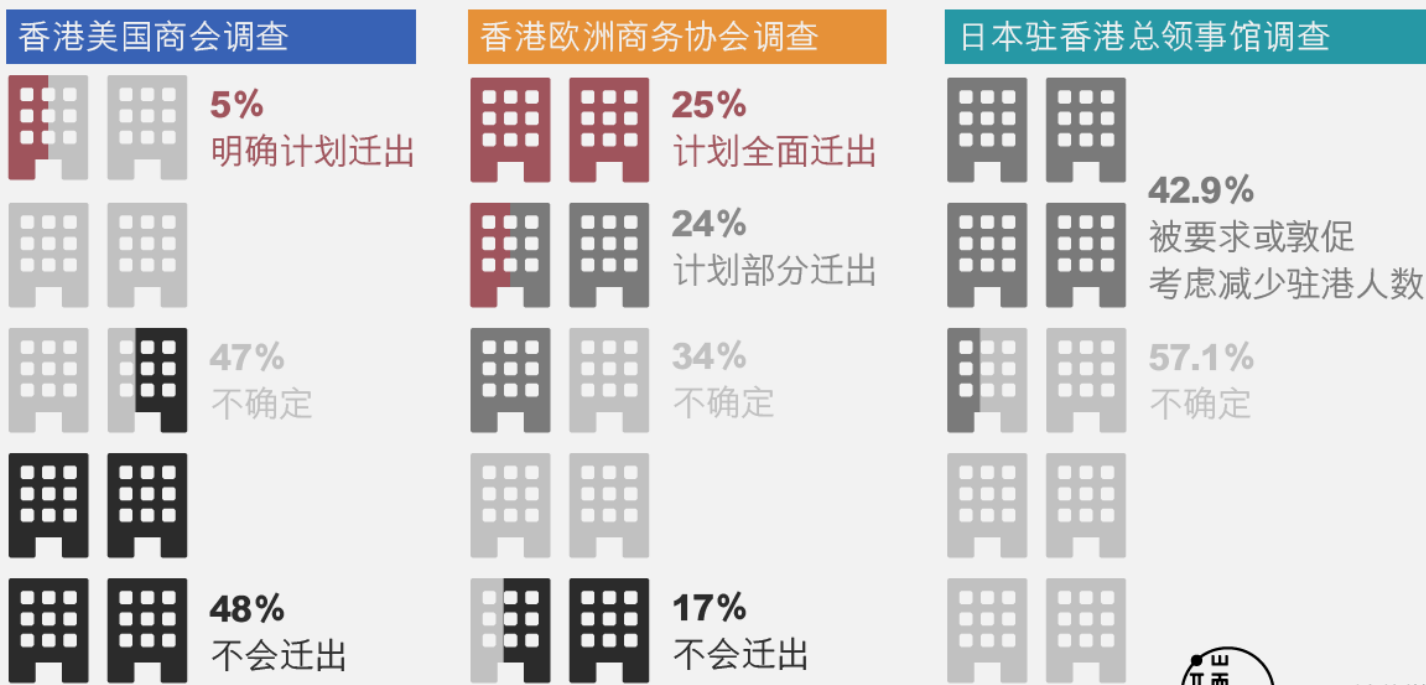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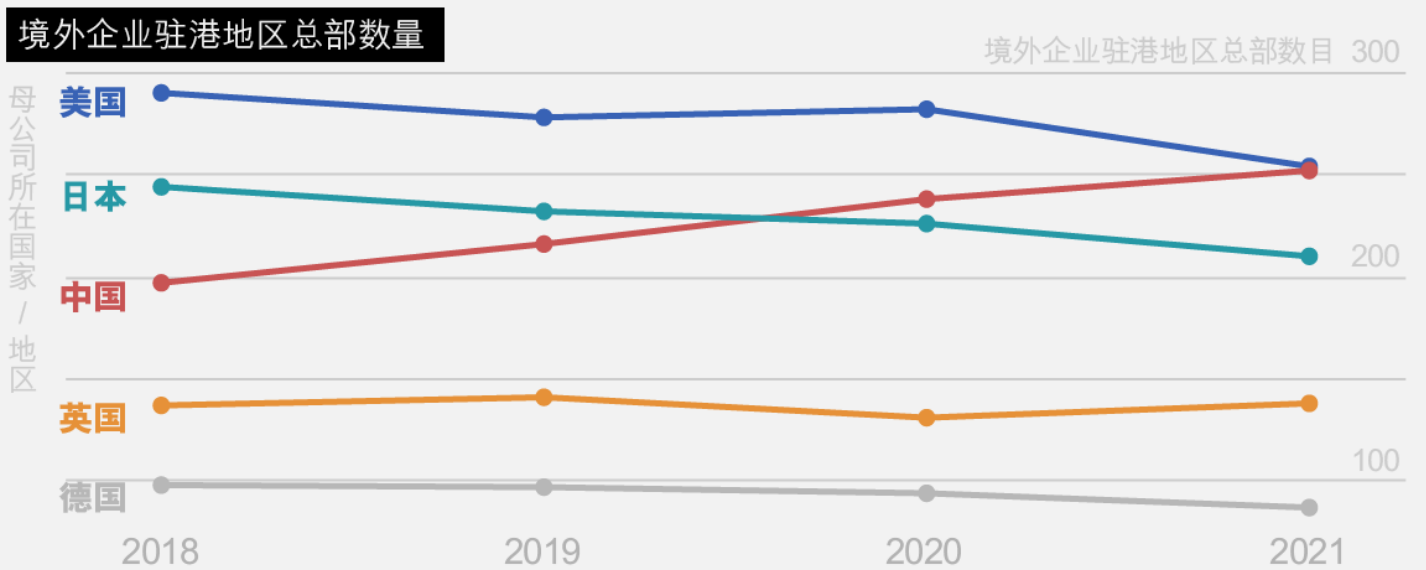
而以Steven观察，不少小型企业，尤其是以国际贸易为主要业务的，都将会离开。“这不仅是因为影响到商务会议，而是员工的生活会如何……他们的员工有如身处监狱，人们亦不会忍受下去。”作为策略顾问公司的主管，Steve留意到他的客人亦正重新计划在港的商业计划，甚至减少投资：“人们觉得香港是一个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意指政局不稳定、通常依赖单一或有限经济产业的政体）。”

根据美国商会调查，44%员工和超过25%企业表示，疫情限制令他们更有可能离开香港。欧洲商务协会调查则显示，49%企业正考虑于未来12个月撤离香港，其中25%更表示将考虑全面迁出。

另外，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据亦显示，2021年美国、日本、德国的企业驻港地区总部数目，均下跌至

2018年以来的新低。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的总部数字3年间则节节上升，创下新高。

境外企业是否受香港防疫政策所限而有意离港？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香港美国商会、香港欧洲商务协会、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



早泰娜补充，清零政策并非企业离开的唯一原因。“我会说是一个额外的原因 (icing on the cake)。”况且，香港的租金，也是世上数一数二的高昂，“试想像，你是一家国际企业，在中港都有办公室。现在，香港和中国似乎没有太大分别，你就需要重新考虑上述分配。”

新加坡跟台湾的经济状况是如何？

香港外资公司和人才流失，他们都往哪里去？所有受访者都认为，两者主要转往新加坡。Gary Ng指出，不论是经济自由度、普通法的法律体系、普遍较低的税率、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结构、金融体系等，与香港最接近的正是新加坡，“可以说是最直接的一个替代选择”。

疫情初期，新加坡和香港同样采取严格的防疫政策，甚或比香港更为严苛。2020年3月，新加坡禁止所有外籍短期旅客入境。同年4月，新加坡录得每日过百宗确诊个案，遂推行“半封城政策”，所有提供非必要服务的工作场所关闭，超市、餐馆等则可继续营业，但不准堂食，并禁止非同住的人于同一居所聚会，以及全国停学等。

然而，情况于2021年8月转变，新加坡逐步放宽入境、商业活动等限制。同年10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全国演说，表示将采取共存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其时亦是新加坡确诊个案每日破千的阶段。

翻查资料，2020年新加坡经济一度陷入建国以来最大萎缩，全年经济增长率为-5.4%。不过，随着防控放宽，加上制造业，尤其受全球对半导体及相关设备的需求带动，整体经济于2021年成功反弹，全年经济增长7.2%。



2022年4月26日，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行人在过马路。摄：Bryan van der Beek/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新加坡最新的防疫政策加上经济增长，是吸引外资人才进驻当地进行投资的条件之一。今年3月，新加坡私人住宅和政府组屋的租金上月均创历史新高，Gary Ng表示：“短期来看，更多跨国企业因地缘政治变化以及香港防疫措施，选择派驻人员往新加坡而非香港，这趋势于一定程度上提升新加坡住房的需求，亦显示于租金走势。”。另外，根据《金融时报》[报导](#)，新加坡房地产网站PropertyGuru行政总裁Hari Krishnan表示，因为香港严格的防疫政策，外籍人士竞相离开，推高了新加坡的房租。

然而，转移至新加坡亦非轻易之事。近年，新加坡政府两度提高外籍员工的最低工资门槛；外国劳工的家属亦须持有公司担保的签证，才能在新加坡工作。不过，世界近八成国家的国民可免签证入境新加坡，最短可逗留30日，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国民更可最长逗留90日；只要在免签期限内出境到邻近国家再重返当地，就可变相“长居”，亦可自由前往其他地区，陈相因认为相当方便：“可能（在新加坡）租一个Apartment（公寓单位），类似Home office（在家办公），就可以开展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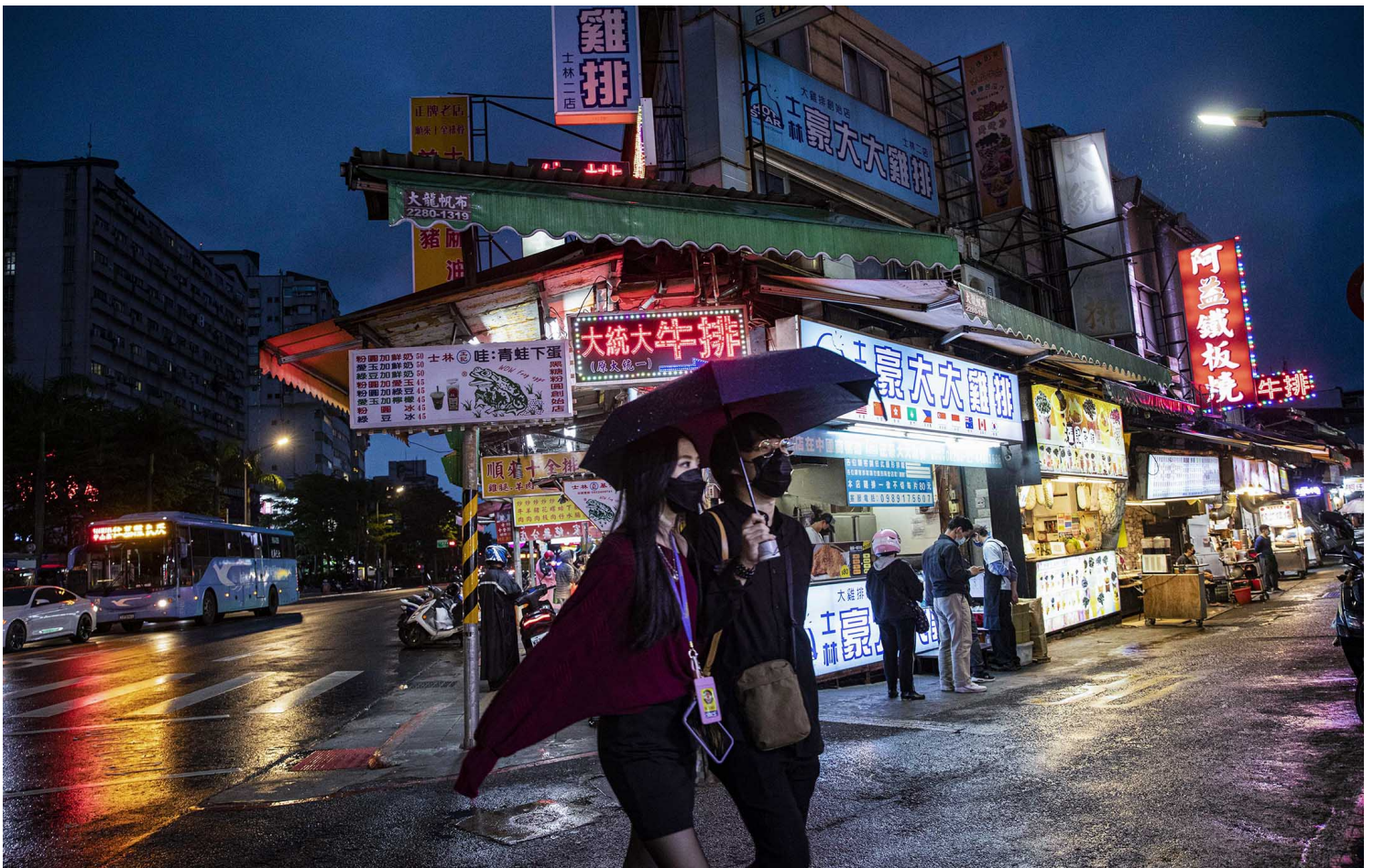
那新加坡能轻易取代香港的金融投资地位吗？以数据而言，新加坡于2020年的资产管理规模（AUM，Assets under management）较往年上升17%，达3.5万亿美金。然而，相香港2020年底数字则是按年上升21%，达4.5万亿美元，仍有一段距离。

若论金融市场，2022年3月，新加坡股市的平均成交额约1.1亿美元，香港则约22.3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数字亦显示，2021年新加坡全年的IPO约为20亿美元，香港约122亿美元。

新加坡由严苛防疫措施变为与病毒共存，拯救国内经济，那么，过去两年多跟香港同样是以“清零”为目标的台湾，防疫政策跟经济状况的关系又如何？事实上，台湾亦早于2020年3月实施边境防疫限制，至2021年5月，台湾连续出现群聚感染，台湾政府将全国疫情警戒提升至三级，即规定停止室内5人、室外10人以上的聚会；全国餐饮业一律外带；卖场及超市加强人流管制等。

台湾上一波疫情在2021年9月开始缓和，不久就松绑并重回防疫限制较少的二级警戒。半年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更宣布要转向“防疫经济新模式”，集中资源催种疫苗、提言筛检与医疗能量、集中检疫所转型等，明言要兼顾经济发展的日常生活。

新模式公布一个多月后，至2022年4月，台湾亦因Omicron来袭令确诊人数急升，5月更出现单日最高达9万宗确诊。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大任指出，当局没有再收紧防疫限制，“应该也是考量到Omicron传染力强，致死率亦不算很高，严格的管治有可能效益不好。”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在今年4月也指出，未来疫情不会严格管制疫情，避免造成经济损失。



2022年4月21日，台北士林夜市，游人走过夜市上的食店。摄：陈焯焯/端传媒

相比香港，台湾整体经济则未受到打击，2021年的经济增长率亦超过6%，创11年来新高。

吴大任解释，台湾的经济结构和香港截然不同。台湾的制造业占整体经济超过3成，亦掌有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最强组合：“就是美国研发，台湾制造。例如高通晶片在台积电生产，苹果的手机晶片也是。”

另外，当时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疫情严重，吴大任指，不少本来将生产线移到其他国家的台商，都将订单转到其他地方，其中包括台湾和中国：“也不是整个厂，只是不同的地方都有部署，是转单效应，在过去1年是不断发生。”

台湾2021年全年的固定投资超过新台币5兆元，创历史新高，其中近85%来自民间投资。台湾统计处分析，台商回流、离岸风电投资挹注、半导体业者扩厂，为推动投资的主要原因；其中又以制造业投资为主，约占总投资额44.6%。

又例如纺织业，去年7月始，越南疫情严重，当地有不少纺织厂线停摆，商家转向其他地区寻求替代产能，台湾纺织厂因而受惠，数间厂家于去年7、8月的业绩创历史新高。

不过，吴大任亦强调，台商回流亦受中美贸易影响：“2018年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有很多厂商

发现，若继续留在中国，他们会很吃亏，所以都搬去其他地方，也不只台湾，东南亚也有。

同时，台湾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台北和新北，而台湾制造生产地区主要位于是桃园以南，包括新竹、台中、台南、彰化、高雄等。“这些地方的疫情其实并不严重，只有桃园和新竹确诊人数稍为多点，对企业生产并没有太大影响。”2021年，台湾出口额约4464亿美元，比前一年同期增长23.4%，创下历史新高；出口中国大陆的规模最大，占总出口42.3%。另外，前30大出口厂商中，有17家以电子产品为主要出口货品。



2022年2月23日，尖沙咀一間招租中的商舖。攝：林振东/端傳媒

上述代价，能否弥补？

面对经济上的挫折，以及人才和外资流失，香港政府一贯指上述为短暂现象，加上政府已于4月放宽部份防疫政策，待疫情过去，一切将回复正常。

Steven坦言，至少他不会再回香港。“即使疫情过去，我也不在乎。”以往香港之所以能够吸引外来的人才和公司，有赖其可预计的法制，以及稳定的政策环境，然而他亦指出，“从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香港政府的决策变得如此疯狂、反复无常、且不可预测（So insane and so erratic, just so unpredictable、”

）。

他形容，离开香港是一个“轻易，却不容易”的决定，亦相信其他离开的人将不再回归。“有些人，例如我，对香港的信心已受到动摇。其他人也可能在外地找到工作、爱人和生活。我不认为他们会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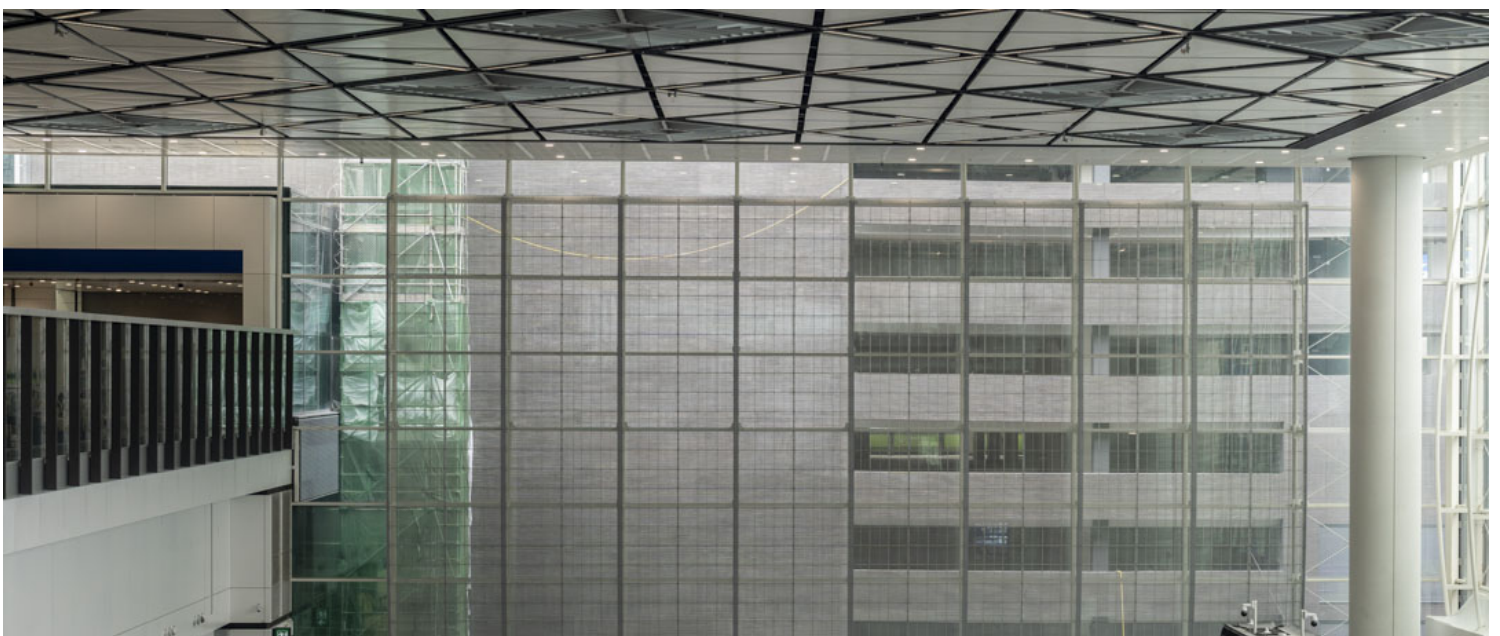
相对个人，企业层面则较为复杂。早泰娜认为自2019年反修例运动，政府敌视“外国势力”，加上一众官员包括特首林郑月娥遭美国制裁，在港的美资一直处于略为尴尬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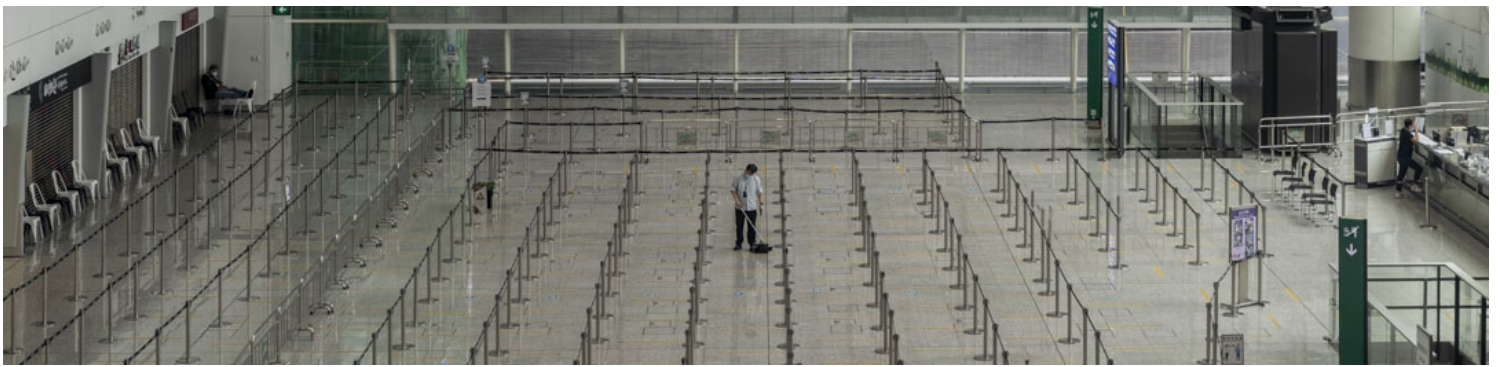
虽然如此，她仍觉得香港保有一定的特殊地位。“香港依然是连接东西的门户，亦有着西方企业能够理解的法律制度，发展完善且优越的金融市场，地理上依然邻近中国。”她称，早已撤离的公司不一定回流，但未来总有企业继续进驻或留在香港，例如部分大型国际企业总需有代表驻足香港，“如果某些企业的目标是金钱，他们可能会无视香港的种种变化。很多在中国的企业已是如此。”

另外，她亦预计来自中国的企业将填补空缺。“香港已经改变，亦仍在改变。但是目前亦未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不是说，香港会就此消失。只是，她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城市……你不是适应，就是离开。”

一切未有定案。2022年5月，香港陆续又再爆出社区传播链，政府专家顾问梁卓伟更指如情况持续，推算月底会爆发第六波疫情。然而第五波疫情后，不同专家开始对于实施“疫苗护照”、“谷针（催谷打针）”等政策引起市民生活各种不便开始表达意见。未来防疫政策松紧，亦是未知之数。

另外，香港目前虽开放非港人入境，但仍要求入境人士进行7至14日隔离。反观新加坡、韩国等国已放宽入境限制，陈相因认为香港的措施不合时宜：“你想想，外国客人过来商议签约，我当你招呼他去玩1日，总计2日好了，但现在香港仍要隔离7日，你觉得合理吗？”





2022年3月30日，香港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堂人流冷清。摄：林振东/端传媒

到底清零政策会否令其他竞争者逐渐追上香港？Gary Ng称有机会只是一时影响。然而，若香港重推严格的防疫政策，甚或只是开放速度不够快，上述影响可能会演变成结构性问题。“大家慢慢习惯原来新加坡都不错，群聚效应开始出来，香港本身应有的增长就会流向其他地方。”

外资撤走，大陆商进场，香港未来定位会变成怎样？“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还是中国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呢？” Gary Ng指出，若香港转型为中国离岸金融中心，即使继续增长，但本质始终会有改变，因为其可替代性会大增。“我觉得这并不代表没有风险。”去年9月，中国国务院发表《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计划将前海建设成开放的经济枢纽，包括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人民币跨境使用等具体方向。

“香港政府目前政策大多著重与中国大陆合作，” Gary Ng说，“然而，这同样可以解读为香港政府投放于吸引外国企业上市的资源将以前减少。”近年，大部分于香港发债及上市企业均为中资企业，中资银行占银行体系资产的36%。

除了金融定位，香港其他优势亦面临威胁。香港另一经济产业为零售服务业，并以“购物天堂”作招徕，但中国各城市逐步开放，成了最近距离的竞争对手。

“例如海南自贸区，现有一定免税额，化妆品占了全中国接近8%的销售额。或者一些中国的游客，未必再来香港购物，未来零售业能否回到原本的水平，还是香港需要找另一个增长点？我觉得这个会决定未来5年甚至10年，香港会否跑输区内其他经济体的因素。” Gary Ng说。“如果香港不放宽这些政策，有机会加快这些在背后原本已在发酵的趋势，香港未来不会没有增长，只是，可能有一些跨国企业，在亚洲投资10分，以前是7分香港，3分在其他地方。未来可能就是五五，甚至是六四比。”

访问尾声，Steven突然提起，于2020年向香港民航处申请“航空营运人许可证”的大湾区航空，该公司董事局主席为中国地产发展商、被称为“深圳王”的黄楚标。

“没有正常人会在这段期间开办航空公司。对我来说，这标志着未来的香港。是的，将来继续会有航空公司

留在香港，但将会是一家中国的航空公司。”他认为，不管未来如何，将来总会有人在香港经济中得益。只是，得益者是谁？。

“经济表现不俗，但，那是谁的经济？（The economy is doing well, but whose economy?”他说。